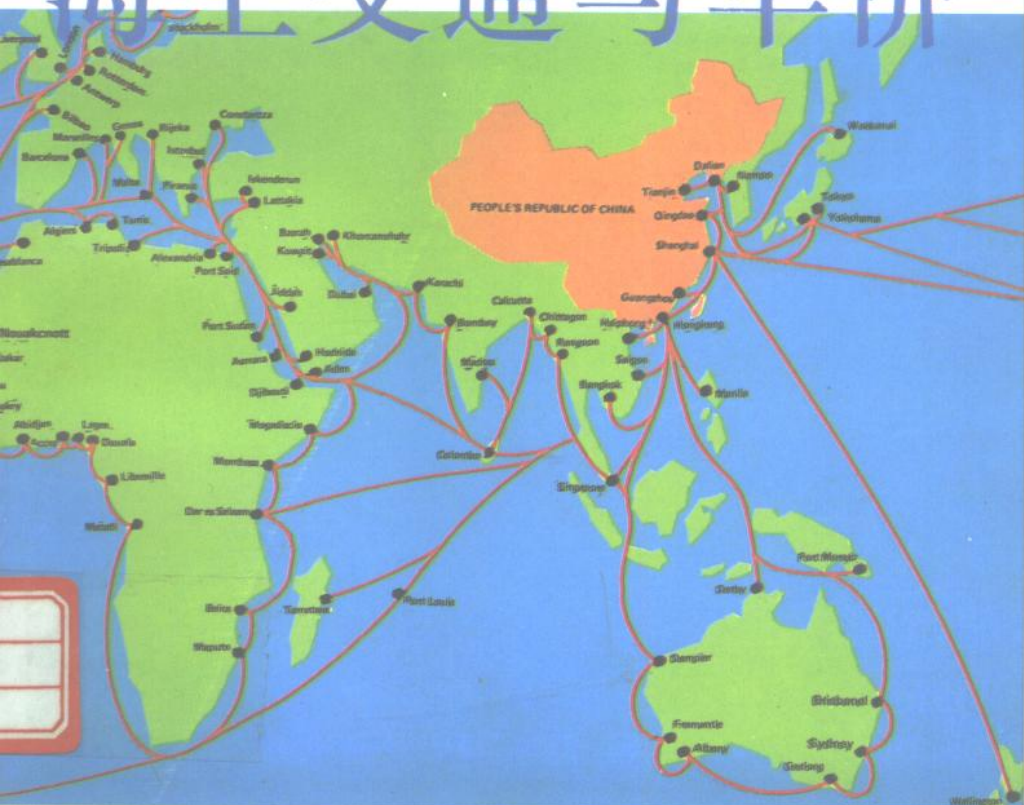


余思伟著

中外 海上交通与华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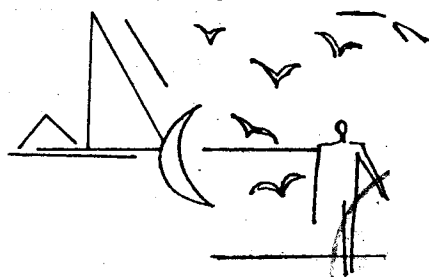


华夏书列

华夏书列

中 外 海 上 交 通 与 华 侨

余思伟著 ● 暨南大学出版社



· 华夏书列 ·
中外海上交通与华侨

余思伟著

*

暨南大学出版社
(广州 石牌)
广东省新华书店经销
暨南大学印刷厂印刷

*

开本: 850×1168 1/32 印张: 10.125 字数: 245 千字

1991 年 8 月第 1 版 1991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2000 册

ISBN7—81029—085—1/K·5

定价: 5.50 元

序

余思伟先生将1981年以来，在国内、外各学术刊物上发表的文章，选编出23篇24万多字，辑成此书。作者是围绕着“中外交海上交通与华侨”这一主题来编选的。全书为三编：第一编，东南亚史及其与中国的关系；第二编，中国古代对外海上贸易；第三编，梯航悉迁海外华侨与华人。从文章的内容看，不仅每一部分各自成编，三编之间也互有联系。

当我竟读这部书稿之后，十多年来的师生情结不断涌现，感慨多端。要而言之，一则以喜，一则以愧。喜的是，学生已有优异的表现，不负当年赏识之心。记得他在大学读书阶段，从他善于提问题所表现出来的思维之活泼，从所写的习作文字之流畅，已引起老师的注目。他刻苦攻读，尊师重道，执师生之礼甚恭。毕业之后，也时来同我讨论学术问题。不期仅仅十余年间，据统计已写了二三百篇长短不一的文章，约得130万字，还写了一本小册子（《爪哇人民大起义》，商务印书馆1987年出版），与别人合写三部工具书（《华侨华人大观》、《香港旅游常识》、《华侨华人大辞典》），一部资料书（《中国古籍中有关新马资料汇编》），可见其用功之勤。愧的是，这些年来，自己学术上的长进甚寡，枉当年为人之师，不配为之作序。但是，“青出于蓝胜于蓝”，乃是

自然规律，如果一代不如一代，学术何以演进？兴念及此，感到应当欢迎后辈超越前辈。所以我终以无限欣悦的心情为此书作序。

余思伟 1977 年毕业于中山大学历史系，后留校在东南亚历史研究所从事教学和科研工作。曾用两年多时间修完硕士研究生专业课程，经受系统的社会科学研究训练。1984 年调任广东省归国华侨联合会主办的《华夏》杂志副主编，还兼广东华侨历史学会副秘书长和暨南大学东南亚研究所特约研究员。他原在中山大学从事东南亚史研究时，便着意于东南亚各国与中国的关系史。这样既可充分利用中国古籍的有关记载，又可收到扬长避短之效。又因东南亚各国与中国有源远流长的密切关系，唯有注意两者的交往，才能把握东南亚历史的总体。要加深了解东南亚各国与中国的关系史，必须研究中国古代的对外关系。古代的外交与外贸往往结合在一起。朝贡贸易就是政治外交与经济外交合而为一的一种形式。因此，本书作者顺势研究了中国的海外贸易，以及主管海外贸易的市舶司制度。又因为海外贸易是华侨的传播器，海贸与华侨是互相关连的。大凡最早的华侨，多是梯山航海、徙迁于海外各地的商人、船工、水手等，由于种种原因而在当地居留下来。当他们在当地站稳脚跟，而且当地又出现较优越的经济机会时，便通过乡情的吸引，把国内的乡亲也迁移过去。泛滥于海外贸易的华侨，又以东南亚地区出现最早，人数最多。因此，作者从研究东南亚史而兼及海上贸易，继而着力于华侨史的研究，是顺理成章的。此书虽是单篇论文的汇编，却是彼此有联系的一部专著。

从此书可以看到作者的治学方法，有其独特之处。首先，深入一点，然后向相关的方面扩展，终于形成相互关联的较大范围的专题。这一方法，可以充分利用掌握的资料，也有利于建立其

专题的理论架构。对某一专题的基本史料掌握之后，可以从不同的视角作探讨，可以触类旁通，可收事半功倍之效。作者能在短短的十年间取得如此丰硕的成果，而且有的文章还为美国、加拿大、荷兰、新加坡、泰国、香港、澳门等国家和地区的报刊所刊登或转载，显然同作者善于治学有关。

其次，力图贯古通今，连结现实与过去间的关系。作者研究的本是古代的中外关系和华侨史，却寄意于现实的华侨社会。第三编的一些文章就是以当今的华侨社会为其内容的。历史学的功能，除其学术的传承之外，是否有社会的现实的使命呢？我一直在不断地思考检讨这一问题。所得的答案是肯定的。人们认识过去，首先出自现实的需要，人们认识的方式、角度，也反映了这种现实。现实是历史的发展，历史可帮助人们理解现实，帮助人们如何处于现实之中，还可帮助人们如何去争取未来。史学的意义即在于此。本书作者正是本着这一精神从事自己的研究的。

本书关于东南亚历史、中国的海外贸易和华侨等问题，不乏精辟的论述。作者在学术上所取得的成绩是显而易见的。当书中的一些论文在学刊发表时，已有人在《中国历史学年鉴》和报刊上发表过评论。这里，我需要补充指出的是：他在治学上所体现出的方法论意义堪与他的研究成果相比美。当然，我也无意说他对每一个问题的看法都会得到读者的赞同。疏忽、舛误之处是在所难免的，我们不当对一部著作提出尽善尽美的苛求。

叶显恩

1991年3月26日

书于广州天河幽篁室

目 录

序	叶显恩
---------	-----

第一编 东南亚史及其与中国的关系

扶南古国初探	(3)
扶南王国与古代中国的关系	(19)
昆仑与扶南之管见	(24)
真腊王国与我国的友好关系	(31)
吴哥王朝的社会结构与经济基础之探讨	(37)
占婆与宋朝贸易关系略述	(47)
马六甲港在十五世纪的历史作用	(51)
葡萄牙人在马六甲殖民统治的特点及其衰亡的原因 ...	(72)

第二编 中国古代对外海上贸易

唐以前广州与海外贸易试探	(95)
明中叶海外贸易对资本主义萌芽的影响	(104)
广州市舶司的历史沿革及其在对外贸易中的作用和影响	(118)
清代前期广州与东南亚的贸易关系	(145)

论澳门国际贸易港的兴起、早期发展及明王朝的管辖	(163)
-------------------------	-------

澳门鸦片税厘并征与拱北海关的建立	(183)
------------------	-------

第三编 梯航懋迁海外华侨与华人

华侨华人在拉丁美洲	(199)
-----------	-------

华人在枫叶之国加拿大	(208)
------------	-------

炎黄子孙在非洲大陆	(218)
-----------	-------

新、马华侨对辛亥革命的卓越贡献	(227)
-----------------	-------

陈六使与南洋大学	(253)
----------	-------

南洋学会五十年	(276)
---------	-------

澳门的归侨及其社团组织	(285)
-------------	-------

中国对华侨史的研究和探索	(290)
--------------	-------

为华教和民族权益鞠躬尽瘁	
--------------	--

——马来西亚华教斗士林连玉	(300)
---------------	-------

第 一 编

东南亚史及其与中国的关系



扶南古国初探

一、扶南的立国、强盛与衰亡

扶南^①是柬埔寨最古老的王国，也是东南亚第一个最强大的国家。在东南亚历史上，扶南占有极为重要的地位。

扶南古国是在谷特牧岛^②上发展起来的。这个岛的原始居民是吉蔑族，又称高棉族。约在公元一世纪时，吉蔑族的女首领柳叶公主^③在谷特牧岛称王^④。当时，尚处于历史黎明时期的部落状态^⑤；公元一世纪后半期，才开始立国^⑥。关于扶南的立国，我国《梁书》卷54《扶南传》有详细的记载。这些记载，虽然夹杂着神话传说，但也说明了当时来自印度的婆罗门教徒混填^⑦，是用武力征服扶南的。混填来到后，自立为国王，又纳柳叶为妻，建立了国家体制。

扶南建国之初，政治中心大约在今波萝勉省的巴南村附近。二世纪初，据康泰《吴时外国传》记载，扶南开始强盛：“扶南王盘况少而雄杰，闻山林有大象，辄生捕取之，教习乘骑，诸国闻而伏之”^⑧。说明骁勇的扶南王盘况已威镇湄公河中下游流域。在三

世纪上半叶扶南更趋强大，大将范蔓在国王盘盘死后被国人推举为王。“蔓勇健有权略，复以兵威攻伐傍国，咸服属之，自号扶南大王。乃治作大船，穷涨海^⑧，攻屈都昆、九稚、典孙等十余国，开地五六千里。”^⑨一般认为这些国家位于马来半岛中北部地区。范蔓时代，湄公河三角洲是扶南的中心地区，并辖有包括今越南南部、老挝南部和泰国东南部的辽阔领域，横跨暹罗湾，势力远披马来半岛。范旃夺得王座后，于242年遣使到贵霜王朝，又在243年遣使来中国。不久，范寻自立登位^⑩，更加善于治理国家。孙权约在243至251年间，派遣中郎康泰、宣化从事朱应出使扶南^⑪。这说明这时扶南已名越东亚，遐迩华夏。

在三四世纪范氏时代，混填带来的印度文化与扶南的土著文化和中国文化相结合，印度文化的影响日渐衰微。在四世纪末，因天竺婆罗门教徒的到来，印度文化又在扶南复兴。《梁书》卷54《扶南传》云：“其后王侨陈如，本天竺婆罗门也，有神语曰，应王扶南，侨陈如心悦，南至盘盘^⑫；扶南人闻之，举国欣戴，迎而立焉。复改制度，用天竺法。”所谓受神之旨意，不言而喻，这是披上了一层宗教迷信的色彩，但这位精通婆罗门经典的教徒的到来，却得到了扶南人的爱戴。他按照印度的政治、文化、宗教等进行一系列改革，它的痕迹至今仍遗留在一些残存的碑文上。通过改革，扶南的政治制度在原来的基础上更臻完善。

必须指出的一点是，扶南受印度文化之影响固然深刻，但早在印度人到来之前，扶南的文化已很发达，扶南人“好雕文刻镂”^⑬，在柬埔寨发现的磨制石器和各种金属工艺品证实了这一记载。“亦有书记府库，文字有类于胡”^⑭，这是早期的吉蔑文。由于早在印度梵文传入之前，已有坚实的土著文化基础，故吉蔑语文始终是当地的主要语文^⑮。同时，扶南并不是只受一国文化的影响，在同各国的交往中，也吸收了其他民族的先进文化。例如康

泰、朱应到了扶南，看见“国人犹裸，唯妇人著贯头。泰、应谓曰：‘国中实佳；但人褻露可怪耳’。寻始令国内男子著横幅。横幅，今干纁也，大家乃截锦为之，贫者乃用布。”^⑧一个先进的民族，除了发扬本民族文化之外，就是善于吸取别的先进民族的文化，此乃扶南兴旺强盛的显著特点之一。

从三世纪到五世纪中后期是扶南的繁荣时期。扶南的繁荣主要是与垄断海上的东西贸易密切相关的。到了五六世纪，马来半岛的顿逊（典孙）、盘盘诸国挣脱了扶南的羁縻，五世纪中爪哇西部多磨罗国的兴起和东邻逐渐强大的林邑抗争，扶南海上贸易无法再垄断，经济上日趋衰落。同时，在514年阇耶跋摩死后，发生王权争夺事件，一定程度上削弱了扶南的统治力量。六世纪初，北方属藩真腊崛起，扶南如芒刺背，肥美之地逐渐被真腊蚕食，并被迫南徙那那那城^⑨。七世纪中，完全被真腊所取代^⑩。

二、扶南的社会性质与宗教问题

关于扶南的社会性质问题，有关文章在这方面注意甚少。诚然，有些学者对此问题也提出了自己的看法。琼塞认为：扶南属下有几个效忠于最高皇上的封建侯国^⑪。这从侧面肯定了扶南属封建社会，但没有提出任何根据。陈序经先生在其《扶南史初探》一书中认为：柳叶时代比较接近于原始社会，但很快趋于衰微，混填做了国王之后，即从母权制度而趋于父权制度。又指出，《梁书》记载混填有7个孩子“分王七邑”，是一种采邑或采邑的萌芽，也是封建制度的表征。他还认为顿逊等国臣属于扶南，是一种联邦制，或者说封建制度中的采邑制^⑫。简言之，认为扶南是从原始社会直接进入封建社会，这一观点的唯一依据是采

邑制。

根据在柬埔寨金边湖以东磅同省的三隆盛发掘出土的石斧、石制装饰品、骨制鱼钩及青铜制的鱼钩、钟、斧等文物和湄公河三角洲冲积层的科学分析，证明远在 3600 多年前，高棉民族已处于金石并用的时代。特别是青铜器的制造和使用，是生产力革命性的进步。据《吴时外国传》记载，扶南船“皆以铁鍬露装”^②，“扶南王范寻以铁为斗鸡假距，与诸将赌戏”^③，证明三世纪前半期，铁器的使用已经相当普遍。这说明在纪元之前，高棉民族已步入人类文明的门槛。

从中国史籍的记载中可看出，扶南立国之前，是柳叶女王统治的，国人都赤身裸露，无尊卑贵贱之分，显然是处于氏族社会向阶级社会过渡的时期，或者说母系氏族的特点还相当浓厚。混填来了以后，柳叶做了混填的妻子，她的权力就全落在当上国王的丈夫手中。混填是以征服者而夺得权力的，这就不存在从带有母权制色彩这一形式向父权制的过渡。混填是开创扶南世袭王系的第一个君主，他为了巩固其取得的统治权，开“生子分王七邑”^④之先河。陈序经认为采邑制是封建社会的表征。我认为混填立国分封，乃表明奴隶制开始在扶南建立；而世袭制的形成则是原始社会最后的崩溃和阶级私有制确立的标志。嗣后，继位者是混盘况。盘况原是七邑之中的一个小王，后逐渐强大，父王死后而承袭王位，他采取了各种离间手段，促使诸邑彼此混战，然后各个击破，收复诸邑。他也采取前王的做法，将自己的子孙分派到各邑。盘况在 90 多岁时死去，死前，他立年幼的中子盘盘为王，将处理国事的大权委托给大将范蔓。盘盘只坐了三年王位就死了。盘盘虽稚弱，但勇健有权略的范蔓将军并不敢去触犯神圣的世袭宗法，轻易废弃而自立为王，只是在盘盘死后，才被国人拥立登位^⑤。

范蔓掌握权柄后，开始挾伐周围各邑，接着，又率军渡海，远征马来半岛，其主要目的之一是“攻略傍邑不宾之民为奴婢”^②。在战争中掳获的俘虏，大部分被强迫在田间劳作和开沟挖渠。据马利雷在俄厄港口的发掘证明：这个离海三英里、在平坦的湄公河三角洲的市区，纵横交错的小运河网穿流其间。这些小运河是延伸 200 多公里的一个水利系统的组成部分，其目的是用于灌溉和排涝^③。如果没有大量的奴隶在扶南王士兵的皮鞭下，头顶烈日，挥汗挖土，这几百公里长的水利灌溉系统是难以完成的。另一部分奴隶则用于家庭劳动。正是奴隶们用血汗换来的劳动果实，以供养奴隶主贵族和一支庞大的征服、压迫他们的军队。

家庭奴隶制在扶南时代非常发达，即使在十三世纪时期的真腊，蓄奴仍非常流行，周达观在《真腊风土记》一书中有这样的记载：“人家奴婢，皆买野人以充其役，多者百余，少者亦有一二十枚，除至贫之家则无之。”奴隶是奴隶主的财产，占有奴隶的多少反映了大小奴隶主所拥有的财富。在东南亚古代的很长一个时期内，奴隶的买卖是很普遍的。奴隶出卖的价值大约是“少壮者一枚可直（值）百布，老弱者止三四十布可得”^④。昆仑奴^⑤也作为一种商品卖到中国，宋人朱或所撰的《萍洲可谈》曰：“广中富人，多蓄鬼奴，绝有力，可负数百斤。言语嗜欲不通，性淳不逃徙，亦谓之野人。色黑如墨，唇红齿白，发髻而黄，有牝牡，生海外诸山中。食生物，采得时与火食饲之，累日洞泄，谓之换肠，缘此或病死，若不死则可蓄。久蓄能晓人言，不能自言。有一种近海者入水眼不眩，谓之昆仑奴。”《萍洲可谈》的记载表明，当时的奴隶买卖已有一段相当长的时间，同时也是很大宗的，奴隶有的来源于山中，有的来源于海边，再一次证实了扶南的征伐战争是奴隶的主要来源。

不但奴隶本人是终身的，连其后代也是主人的奴婢。奴隶们

自相配偶，“或与外人交，至于有妊养子，主人亦不诘问其所从来，盖以其所，不齿且利，其得子仍可为异，曰奴婢也”^⑧。为什么奴隶占有一直能延续到吴哥时代的中后期呢？其主要原因正是奴隶的世代相传。奴隶只是供使唤的活的牲畜，住在肮脏的高脚屋底下，如执服役，才登上楼，跪下合掌，等待主人吩咐。奴隶与奴隶主之间的界河异常分明，根深蒂固，据周达观说，如果中国人去作客，一与奴隶接近，“主人闻之，次日不肯与同坐，以其曾与野人接故也”^⑨。奴隶主可任意鞭打奴隶，奴隶就得俯首受杖，略不敢动。奴隶经常以逃跑反抗，但“或有逃者，擒而复得，必于面刺以青，或于项上带铁以锢之，亦有带于臂、腿间者”^⑩。这样，奴隶就再难以逃脱奴隶主的魔掌。奴隶又是祭神的牺牲，《隋书》曰：“城东有神名婆多利，祭用人肉。其王年别杀人，以夜祀祷”^⑪。在这种虚伪的宗教面纱遮掩下，流淌着奴隶们的鲜血。

扶南没有成文的法律，据《梁书》卷54《扶南传》记载：“国法无牢狱，有罪者，先斋戒三日，乃烧斧极赤，令讼者捧行七步。又以金环、鸡卵投沸汤中，令探取之，若无实者，手即焦烂，有理者则不。又于城沟中养鳄鱼，门外圈猛兽，有罪者，辄以喂猛兽及鳄鱼，鱼兽不食为无罪，三日乃放之。”又据《吴时外国传》记：“扶南有讼者，烧铁令赤，以钳举铁，着手行七步，无罪者手不烧，有罪者手即焦”^⑫。又查检《太平御览》卷786引《外国传》曰：“扶南人若户中亡器物者，即以米一升诣神庙气神，见盗者，以米着神足下，明日取米，呼户中奴婢分令啗之，盗者口中血出，米完〔全〕不碎，不盗者入口即败。”这种用神知善恶的“神判法”，是从婆罗门教中毗湿奴（善神）对“诚实之人”的保护和湿婆（恶神）对“有罪之人”的严惩这一宗旨中引伸而来的，其实质是野蛮的、血腥的奴隶主专政。

在奴隶主统治阶级内部，等级森严。位于马来半岛的扶南属

国槃槃就是一例，《梁书》槃槃国条曰：“王坐金龙床，每坐诸大人皆两手交抱肩而跪及。其国多有婆罗门自天竺来，就王乞财物，王甚重之。其大臣曰勃郎索滥、次曰昆仑帝也、次曰昆仑勃和、次曰昆仑勃帝索甘”^⑥。从中可以看到君主的绝对统治权力，大王以下的四个等级是很分明的。奴隶主贵族居住在城堡内，而在城外栖身的奴隶则由“邠延”^⑦管理。可以断定，扶南本土的奴隶主贵族阶层与其属国是基本相同的。

在扶南奴隶社会里，以国王为首的贵族与平民形成了一条难以逾越的鸿沟。范旃在位时，建立楼台水阁以供观赏游玩之用。国王等居住在重阁内，器皿俱为金银所铸，王城四周围上木栅。平民则住在棕榈叶覆盖的草房里。男子戴锦为横幅，贫者以布自蔽，贫富显明。但扶南还拖着一条浓厚的氏族残余的尾巴，“男女恣其奔随”^⑧，“国王行乘象，妇人亦能乘象”^⑨，国王还经常到民间斗鸡斗猪为乐。

扶南是受印度文化影响很深的国家。贵霜帝国是在公元一世纪中叶兴起的，这时正是印度奴隶制高度发展的时期。混填适于此时王位扶南，四世纪末侨陈如又到扶南“复改制度，用天竺法”。他们都是婆罗门教徒，而他们的国家又处于奴隶社会时期，他们在扶南建立的国家体制和进行的各种改革，必然是按照印度式的奴隶制，不可能凭空设想他们所不知道的封建制度（五至七世纪时印度封建制度才逐渐形成）。婆罗门种姓对扶南、林邑是有一定影响的。扶南的婚姻与林邑大体相同^⑩，《梁书》卷54林邑条载：“其大姓号婆罗门，嫁娶必用八月，女先求男，由贱男而贵女也。同姓还相婚姻，使婆罗门引婿（婿）见妇，握手相付，咒曰‘吉利、吉利’，以为成礼”。可见在这一时期内，扶南奴隶制的形成和发展，在相当程度上受印度奴隶制的影响。

在扶南时代，宗教非常昌盛，它是统治阶级所依赖的精神支